

# 《资治通鉴》叙事中的史事 考订与历史重述

——基于唐太宗即位之初“诸将争功”事件书写的个案分析

张耐冬 刘后滨

**[摘要]** 《资治通鉴》对李世民即位之初褒奖功臣时出现纷争的相关叙述，是不同于唐代实录、国史与《旧唐书》的另一种叙事，是以“资治”史观为出发点，在原有史料基础上进行的历史想象与情景建构。该案例体现了《资治通鉴》不同于此前各类编纂史料的叙事结构与叙事手法，基于这一案例，可以对《资治通鉴》叙事特点加以归纳，并提出《资治通鉴》叙事研究的基本方法。

**[关键词]** 《资治通鉴》；“诸将争功”；叙事模式；历史想象

**[作者简介]** 张耐冬：历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讲师；刘后滨：历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872）

在中国古代史学史上，《资治通鉴》（以下简称《通鉴》）无疑是最为重要的一部编年体史书。自该书问世以来，历代史家都曾就其史观、史学与史料价值多有讨论。不过，在现今的学术视野下，我们要探寻其最值得注意的史学价值究竟是什么？

海登·怀特以叙事模式的类型区别为标准，将历史著述分为编年史、故事、情节化描述、论证模式、意识形态蕴涵模式等几种。在他看来，编年史是将原始素材加以简单时间排列的历史叙述模式<sup>[1](P6)</sup>，这是就他习见的编年史而言。《通鉴》显然并不是这样的“编年史”，它取材于一些业已经过编纂加工的文本，司马光及其合作者

又按照他们的标准将这些素材重新加以编排，使本就经过前代史家“情节化”与逻辑化的历史叙事再经历一重加工，形成一个新型叙事文本。因而，应在文献比对的基础上，判别《通鉴》中的内容哪些直接承袭自前代史书的叙事，哪些是司马光对历史文本所做的新解释，从而对《通鉴》中某些具体事件的叙事类型、叙事特征及全书的叙事模式进行解析。

怀特对待历史叙事的态度被视为“后现代”的代表，他明确提出“我将历史说成是事实的虚构化和过去实在的虚构化”<sup>①</sup>。本文并不赞同这个观点，但其认为历史叙事必然要带有“诗性的”和“修辞性的”特征这一思路，依然值得我

**[基金项目]** 中国人民大学教师教学发展改革项目“大学通识教育中的历史学及相关课程建设”（297615120521）

<sup>①</sup> 参见海登·怀特为《元史学》中译本所写的前言。怀特对历史的“虚构”特征做过说明：“我倾向在现代边沁主义和费英格尔的意义上理解虚构的观念，即将它看成假设性构造和对于实在的‘好像’（as if）式描述，因为这种实在不再呈现在感知前，它只能被想象而非简单地提起或断定其存在。”参见海登·怀特：《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

们重视。古代中国最早讨论历史编纂学的专门论著中，《文心雕龙·史传》与《史通》都非常强调编排与叙事的作用，中国传统史学也的确强调叙事在史书编纂中的作用，因而，将《通鉴》置于历史叙事的考察范围加以分析，也是古代史学研究与古代史研究应有的题中之意。

学界对《通鉴》的叙事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sup>①</sup>，不过并未形成较为一致的研究思路与方法。本文将《通鉴》对唐太宗即位之初“诸将争功”之事的记载为案例，对《通鉴》的历史叙事进行个案解析，并尝试对《通鉴》叙事研究的方法做一探索。

## 一、《通鉴》对“诸将争功”的记载及其史源考察

《通鉴》卷一九二《唐纪八》高祖武德九年记载：

（九月）己酉，上面定勋臣长孙无忌等爵邑，命陈叔达于殿下唱名示之，且曰：“朕叙卿等勋赏或未当，宜各自言。”于是诸将争功，纷纭不已。淮安王神通曰：“臣举兵关西，首应义旗，今房玄龄，杜如晦等专弄刀笔，功居臣上，臣窃不服。”上曰：“义旗初起，叔父虽首唱举兵，盖亦自营脱祸。及窦建德吞噬山东，叔父全军覆没；刘黑闥再合余烬，叔父望风奔北。玄龄等运筹帷幄，坐安社稷，论功行赏，固宜居叔父之先。叔父，国之至亲，朕诚无所爱，但不可以私恩滥与勋臣同赏耳！”诸将乃相谓曰：“陛下至公，虽淮安王尚无所私，吾侪何敢不安其分。”遂

皆悦服。房玄龄尝言：“秦府旧人未迁官者，皆嗟怨曰：‘吾属奉事左右，几何年矣！今除官，返出前宫、齐府人之后。’”上曰：“王者至公无私，故能服天下之心。朕与卿辈日所衣食，皆取诸民者也。故设官分职，以为民也，当择贤才而用之，岂以新旧为先后哉！必也新而贤，旧而不肖，安可舍新而取旧乎！今不论其贤不肖而直言嗟怨，岂为政之体乎！”<sup>[2](P6022-6023)</sup>

此段文字是《通鉴》中有关玄武门事变后李世民用人、赏功的案例，因其事关李世民即位后的用人方略与权力格局重组，故在唐史研究中极具意义。整段记载从《通鉴》自身的叙事逻辑而言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以“（九月）己酉”为时间标志的“诸将争功”事件，这一事件的叙述似乎是按照时间顺序自然排列，至“遂皆悦服”结束；二是追记李世民与房玄龄就“秦府旧人”的任用问题对“为政之体”的讨论，自“房玄龄尝言”至本段末。之所以要追记这一段，是为了说明李世民即位后对“为政之体”的坚持——无论是封赏功臣还是任用官员，都以“至公无私”、“择贤才而用之”为原则。

不过，由于《通鉴》主要取材于前代史书而非原始材料，故而“诸将争功”之事史源出自何处，《通鉴》在采录时对材料如何取舍、有无删削，是探讨其叙事特点与叙事方法时首先应解决的问题。就此段中第一部分关于封赏功臣之事而言，《通鉴》的叙事并不完整，且与其所据史料来源有一定出入。据《唐会要》卷四五《功臣》记载<sup>②</sup>：

（武德）九年九月二十四日诏曰：“褒贤

<sup>①</sup> 辛德勇考察《通鉴》记载汉武帝时期“巫蛊之祸”与“轮台诏”的研究，以及李浩针对辛文而发表的商榷之作，可以视为对《通鉴》叙事研究的最新尝试。辛文立足于文献比对，认为司马光“出于资以鉴戒的特殊需要而率以己意取舍史料”，并且进一步提出“此种情况在《通鉴》中随处可见，因此所谓《通鉴》取舍史料无征不信且严谨不苟的看法是很荒谬的”。参见辛德勇：《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与司马光的重构》，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6）（后辛德勇在此基础上出版了《制造汉武帝》，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李浩指出辛文中存在大量的史料误读，认为《通鉴》叙事与《汉书》等原始史料高度吻合，不存在重构现象。李浩强调：“历史阐释不等于历史重构，《通鉴》之叙事、议论仅是对公认史实不同视角的历史观察，司马光没有也不可能重构历史”。参见李浩：《“司马光重构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说献疑——与辛德勇先生商榷》，载《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6）。辛、李二人对《通鉴》的不同理解，基本是立足于文献学领域内的史源考察，对历史叙事其实涉及不多。除辛、李二人的相关讨论之外，姜鹏在分析、比较《通鉴》原文与明人严衍《资治通鉴补》改订文字的基础上，指出《通鉴》原本就不是“一种单纯的历史叙述文本”，而是“借历史叙述以表达施政理念”，《通鉴》中很多看似有“破绽”的地方，其实隐含了司马光表达自身理念的深意。参见姜鹏：《司马光施政理念在历史编纂中的表达——从〈资治通鉴补〉对原作的改动说起》，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2）。

<sup>②</sup> 所据《唐会要》清刻本因避康熙皇帝玄烨名讳改“玄龄”为“元龄”，今回改。个别地方重新标点。

昭德，昔王令典。旌善念功，有国彝训。吏部尚书上党县长孙无忌、中书令临淄县侯房玄龄、右武侯大将军尉迟敬德、兵部尚书建平县男杜如晦、左卫将军全椒县子侯君集等，或夙预谟谋、绸缪帷幄，竭诚倾恳、备申忠益；或早从任使、契阔戎麾，诚著艰难、绩宣内外。义冠终始，志坚金石，誓以山河，实允朝议。无忌封齐国公，玄龄封邢国公，敬德封鄂国公，如晦封莱国公，君集封潞国公，其食邑各三千户。”遣侍中陈叔达于殿阶下唱名示之。上谓曰：“朕叙公卿勋劳，量定封邑，恐不能尽当，（宜）各自言。”从叔父淮安王神通进曰：“义旗初起，臣率兵先至。今房玄龄、杜如晦等刀笔之人，功居第一，臣窃不伏。”上曰：“义旗初起，人皆有心。叔父虽得率兵，未尝身履行阵。山东未定，受委专征。建德南侵，全军陷没。刘黑闥翻动，望风而破。今计勋行赏，玄龄等有筹谋帷幄、定社稷之功，所以汉之萧何虽无汗马，指踪推毂，故得功名第一。叔父于国至亲，诚无所爱，但以不可缘私滥与勋臣共赏耳。”初，将军邱师利等咸自矜其功，或攘袂指天，以手画地。及见淮安王理屈，自相谓曰：“陛下以至公行赏，不私其亲。吾属何宜妄诉。”<sup>[3](P800)</sup>

《唐会要》所载文字较《通鉴》更为详细，且有一处细节与《通鉴》存在差异，即将军丘（邱）师利等“自矜其功”之事。据《唐会要》，此事发生在诏书颁下之前，而补记于李世民间训诫李神通之后；而《通鉴》则将“诸将争功”系于诏书公布当日，成为李神通论功的背景。

关于“诸将争功”之事，与《唐会要》记载情况一致者，有《册府元龟》卷一二八《帝王部·明赏第二》<sup>[4](P1531)</sup>和《旧唐书》卷六八《房玄龄传》<sup>[5](P2461)</sup>。此外，尚有其他记载版本，其中并未出现“诸将争功”的内容，只截取了功臣封爵授食邑后李神通与李世民的君臣对话，《旧唐书》卷六十《宗室列传·李神通传》<sup>[6](P2341)</sup>与《贞观政要》卷三《论封建》<sup>[7](P172-173)</sup>即是如此。

就《通鉴》所记“诸将争功”之事的史源而

言，《册府元龟》、《唐会要》和《旧唐书·房玄龄传》非常明显地出于同一个系统，即唐代本朝所修的国史、实录。同时还存在另一个记载系统，即《旧唐书·李神通传》和《贞观政要·论封建》，这两段材料中都未记丘师利等人争功之事，应是在前一个系统的基础上所做的删节，为说明某一主题（如《贞观政要·论封建》即与宗室诸王相关而与他人无涉）或为突出传主生平（如《旧唐书·李神通传》）。《通鉴》记此事时，明显选择了前一个文献系统作为史源，而这一系统直接以唐代国史、实录为源，故而最为接近唐代史官记述之原貌。《通鉴》在编纂时对这一系统所做的记载进行了改动，将原本发生在诏书公布前诸将“自矜其功”的夸耀行为改写成诏书公布现场的“诸将争功”，这一改动缺乏直接的文献证据，应视为《通鉴》叙事过程中的一次“虚构”。

《通鉴》此段文字第二部分对房玄龄与李世民就秦府旧人任用问题的讨论，在《贞观政要》卷五《论公平》中有类似的记载：

太宗初即位，中书令房玄龄奏言：“秦府旧左右未得官者，并怨前官及齐府左右处分之先己。”太宗曰：“古称至公者，盖谓平恕无私。丹朱、商均，子也，而尧、舜废之。管叔、蔡叔，兄弟也，而周公诛之。故知君子者，以天下为心，无私于物。昔诸葛亮明，小国之相，犹曰‘吾心如秤，不能为人作轻重’，况我今理大国乎？朕与公等衣食出于百姓，此则人力已奉于上，而上恩未被于下，今所以择贤才者，盖为求安百姓也。用人但问堪否，岂以新故异情？凡一面尚且相亲，况旧人而顿忘也！才若不堪，亦岂以旧人而先用？今不论其能不能，而直言其嗟怨，岂是至公之道耶？”<sup>[8](P278-279)</sup>

此段记载较《通鉴》“诸将争功”第二部分为详，且在其他史料中未见，应是《通鉴》参考的史源。但文中未记房玄龄与李世民对话的具体时间，此事是否发生在九月二十四日前已不可考，《通鉴》将其视为“诸将争功”发生前之事，未有明确证据。此事的真实性虽无可置疑，但《通鉴》的这一编排方式可视为在两件可能彼此无关的事件中建立逻辑联系的“发明”。

## 二、虚实之间：“诸将争功”相关史事与《通鉴》叙事模式的分析

以上对《通鉴》中“诸将争功”的一段文字与其史源做了比较，并认为将“诸将争功”置于褒奖功臣当日、将房玄龄与李世民讨论秦府旧人的处置问题与“诸将争功”相联系这两个细节属于司马光及其合作者在其采录的史源之外所做的历史建构。不过，这仅是从史源学角度得出的结论，与史源不同也并不等于与史实不符。它回答不了的问题是：司马光及其合作者为何会有这种建构？这一建构结果是史实考订的结论，还是如一些研究者所言，只是司马光出于“资治”目的而表现个人的政治观点？<sup>①</sup>

就“诸将争功”之事的两部分而言，在史实层面要解决的问题是：“争功”之事发生在九月二十四日当场，还是在此之前？丘师利是否是争功中值得重点记述的人物？房玄龄与李世民议论秦府旧人安置问题，与“诸将争功”之事是否有关联？

据《唐会要》记载，李神通表达不同意见是在李世民“朕叙公卿勋劳，量定封邑，恐不能尽当，（宜）各自言”的表态之后，将军丘师利等“自矜其功”的行为出现在九月二十四日诏书颁布之前。若果真有丘师利等指天画地的争功情景存在，则此前必有论功行赏之令，此其一；依《贞观政要》与《通鉴》所记，秦府旧人未见任用而发怨怒之辞，房玄龄便将其言进奏，若有争功之举，恐怕不得不闻，此其二；丘师利等如事前有争功，在颁诏之时则不应无言，此其三。这三点在《通鉴》问世前的各种文献中均无体现，确实有些令人费解。而这三点之中，在颁诏之前有论功之令实为后两点之前提，如此事并不存在，后面的事情也不会发生，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怀疑论功之令是否真实存在。考诸史实，李

世民从武德九年六月四日发动玄武门政变起至八月登基称帝，此间近有建成、元吉之党需抚平，远有李瑒谋反之事待处置；内有重组中枢政治格局之要务，外有与突厥重建关系并抵御其进犯之难题，民间亦需安抚，如此种种，皆为急务，无法好整以暇地为臣下论功，故对长孙无忌等功臣之赐爵授食邑之事亦推迟至九月二十四日。由此推之，论功之令恐怕未必存在，而丘师利等争功之事可能也未曾发生过。

从丘师利的身份与事迹也可证明这一点。其在大业末年是关中一带聚兵自保的豪强，据《旧唐书》卷五九《丘和附子行恭传》记载，“大业末，（丘行恭）与兄师利聚兵于岐、雍间，有众一万，保故郿城，百姓多附之，郡盗不敢入境”<sup>[9](P2326)</sup>。《资治通鉴》卷一八四《隋纪八》记载，恭帝义宁元年九月，李唐创业之初，平阳公主在其夫柴绍自长安赴太原后“归郿县别墅，散家货，聚徒众”<sup>[10](P5757)</sup>，以响应太原起兵。在李氏所招纳的地方势力中，就有丘师利兄弟。《旧唐书》卷五八《柴绍传附平阳公主传》记录了李氏家僮马三宝出面劝诱他们归附之事：“又说群盗李仲文、向善志、丘师利等，各率众数千人来会。”<sup>[11](P2315)</sup>李氏招附的兵马与李神通在关中的队伍成为李渊进兵长安的重要内应，当李渊渡过黄河以后，包括丘师利在内的“关中群盗，皆请降于渊，渊一一以书慰劳授官，使各居其所，受敦煌公世民节度”。就在正式归附李世民前后，丘师利还派遣其弟丘行恭率兵计斩围攻扶风太守窦璡的“平凉奴贼”首领，《资治通鉴》卷一八四《隋纪八》恭帝义宁元年九月条记载此事云，“行恭帅五百人负米麦持牛酒诣奴贼营，奴帅长揖，行恭手斩之，谓其众曰：‘汝辈皆良人，何故事奴为主，使天下谓之奴贼！’众皆俯伏曰：‘愿改事公。’行恭即帅其众与师利共谒世民于渭北，世民以为光禄大夫”<sup>[12](P5758-5759)</sup>。后来丘行恭跟随李世

<sup>①</sup> 前引辛德勇与姜鹏文都持此观点，这是学界对《通鉴》的一种态度，即认为“资治”必然会损害对历史事实的记述，如夏祖恩认为，“过分强调史学的资治功能只会使史学沦为统治阶级的御用工具，甚至可能导致历史学的科学性荡然无存”，参见夏祖恩：《资治与垂鉴不是作史的宗旨——评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载《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2）。另一种态度认为，《通鉴》在材料选用、考辨与记载方面皆体现了求实的史学传统，金毓黻、柴德赓、张舜徽等即持此观点。将这两种态度做综合表达的代表是朱维铮，他既对“以史为镜”的“资治”观点予以批评，又充分肯定《通鉴》历史编纂学的成就，特别是求实之成就，参见朱维铮著，廖梅、姜鹏整理：《中国史学史讲义稿》，236-243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朱维铮的观点值得注意，因为他说出了一事实：“资治”与“求实”可以出现在同一部古代史著中，若无具体例证便概言《通鉴》是“资治”还是“求实”，并无实际意义。

民长期征战，在唐朝初年的统一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丘师利则事迹无闻，仅在武德五年迎接自岭南归顺的其父丘和入朝之时出现过一次。<sup>[13](P2325)</sup>

另外，《元和姓纂》中有简略记载：“师利，左监门大将军，冀州刺史，都督，谭国公”<sup>[14](P709)</sup>。据此可推知，丘师利后来仕途虽还算顺利但并不显赫，其谭国公的爵位袭封自其父丘和。

据《旧唐书》卷二《太宗本纪上》记载，在九月二十四日封赏之后，十月癸酉又进一步落实了元老和功臣“食实封”的待遇：

裴寂食实封一千五百户，长孙无忌、王君廓、尉迟敬德、房玄龄、杜如晦一千三百户，长孙顺德、柴绍、罗艺、赵郡王孝恭一千二百户，侯君集、张公谨、刘师立一千户，李世勣、刘弘基九百户，高士廉、宇文士及、秦叔宝、程知节七百户，安兴贵、安修仁、唐俭、窦轨、屈突通、萧瑀、封德彝、刘义节六百户，钱九陇、樊世兴、公孙武达、李孟常、段志玄、庞卿恽、张亮、李药师、杜淹、元仲文四百户，张长逊、张平高、李安远、李子和、秦行师、马三宝三百户。<sup>[15](P31)</sup>

九月二十四日诏中第一等功臣五人的“食邑三千”只是象征性的虚封，食实封才是他们享受的实际经济待遇。这份“食实封”的名单囊括了太原起兵以来的功臣，体现了李世民即位后重组朝内权力格局的初步结果。在这份名单中依然没有丘师利，可见他远未达到可与房、杜争功的资格。

既然当时不具备为臣下论功的稳定环境，丘师利本人也不具备争功的资格，为何《唐会要》等文献会有其争功的记载？这应该是受作为其蓝本的唐代国史、实录的叙事模式之影响。

实录与国史是在原始材料基础上所做的历史编纂，史官在纂修实录与国史时，要选择一定的叙事模式对原始材料加以编排。唐初《汉书》学兴盛，这对其时的本朝史编纂产生了影响，套用《汉书》的叙述时时可见。

《汉书》卷三九《萧何传》记汉初封功臣之事，应是唐代史官记载“诸将争功”之事的蓝本，略如下：

汉五年，已杀项羽，即皇帝位，论功行封，群臣争功，岁余不决。上以何功最盛，先封为酈侯，食邑八千户。功臣皆曰：“臣

等身被坚执兵，多者百余战，少者数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萧何未有汗马之劳，徒持文墨议论，不战，顾居臣等上，何也？”上曰：“诸君知猎乎？”曰：“知之。”“知猎狗乎？”曰：“知之。”上曰：“夫猎，追杀兽者狗也，而发纵指示兽处者人也。今诸君徒能走得曾耳，功狗也；至如萧何，发纵指示，功人也。且诸君独以身从我，多者三两人；萧何举宗数十人皆随我，功不可忘也！”群臣后皆莫敢言。<sup>[16](P2008)</sup>

《汉书》的此段记载，由“论功行封—群臣争功—钦定萧何食邑高于群臣—群臣质疑—刘邦为群臣释疑—群臣噤声”等细节组成，这些细节构成了完整的叙事链条，使封赏功臣这一事件具有丰富的情节性。与这段文字相比较，《唐会要》等文献中体现出的唐代国史实录的叙事链条则由“颁诏赏功—李神通质疑房、杜封赏过重—李世民为之释疑—补记诸将争功事—诸将叹服”等细节构成，除了缺少“论功行封”的明确记载、在描述“诸将争功”时使用了追叙法，其在细节上与《汉书》极为相似。若按照时间顺序将其叙事过程还原，其完整结构应为“诸将争功—颁诏赏功—李神通质疑—李世民释疑—诸将叹服”，与《汉书》几乎如出一辙。这应是唐代史臣对《汉书》叙事的主动模仿，而非当时史实的直接反应，这一点从缺乏争功之前提“论功”就可证明。

唐代史臣在模仿《汉书》叙事结构时，忽略了一些最基本的问题：其一，汉高祖时期对功臣的“论功行封”，是在汉并天下之后，当时局势与武德九年夏秋之际相比较为缓和，可以从容论功；其二，西汉帝国是在“军功受益阶层”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sup>[17]</sup>，功臣们在帝国的权力结构中自有其强大影响力，刘邦晚年也通过“白马之盟”承认了刘氏与功臣共同构成核心集团的现状，这也是唐初功臣难以与之比拟的。脱离了《汉书》叙事所在的时空环境而套用其叙事模式，使这个生造出的叙事结构中存在极大的漏洞，其中最明显的一点，就是不具备争功资格的丘师利作为争功的代表，被推向舞台的中心。

唐代修史者在记载丘师利等争功之事时，似乎怀有一种游移不定的态度，一是并未明言他们欲与何人争功，仅仅说他们“自矜其功”；二是

在写作时采用追叙之法，而并未将丘师利等人的行为当作此段叙事中的重点。这种态度，使唐代实录、国史中的“诸将争功”叙事与其汉代蓝本相比存在结构上的明显差异。丘师利的资历与功绩不足以担起争功重任，恐怕是令唐代史臣为难的重要原因。

丘师利争功之行为虽不能成立，但他与其他人“自矜其功，或攘袂指天，以手画地”之事应不是唐代史臣的向壁虚造。以丘师利为代表的“诸将”之所以会叫嚣自己功绩如何如何，应该也是与李世民用旧者在其登基后企望改变地位而未遂时的情感宣泄。史臣在编纂实录、国史时将此事件与为首功者赐爵授食邑之事相缀合，完成了模拟《汉书》的叙事结构。

而反观《通鉴》关于“诸将争功”之事的记载，在第一部分，整个叙事链条包含了“颁诏—诸将当场争功—李神通质疑—李世民释疑—诸将悦服”等细节，且完全按照时间顺序，使论功争功被描述为同一天发生之事。与《汉书》及唐代史臣的模拟之作相比，《通鉴》的叙事结构较为精简，而大体叙事框架则与二者相同。

司马光及其合作者在保留其史源的叙事框架时，巧妙地回避了“论功”前提缺失的情况下记述事前争功存在的漏洞，将争功之事置于诏书颁布当日；在记载争功之时，又隐去了史源中作为争功重点人物的丘师利之名，但以“诸将”作为概称。这一处理方式避开了史源中的不合理之处，做尽量接近史实的努力。

不过，这种努力也同样要面对后来者的质疑。在颁诏当日，是否有可能出现“诸将争功”的场面？史源没有提供任何可以作为线索的依据，因而这一场景是《通鉴》作者的想象。这一想象若要符合其历史情境，就必须有具体史实作为基础，而史源中曾记载的两个细节——诸将事前矜功之事与诏书颁布后李神通发表不同意见，正为进行想象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司马光等应该认定李神通上前质疑时存在一个群臣不平的氛围，于是将史源中发生在九月二十四日之前的争功时间挪到了褒奖首功者的现场。而完成这一想象，并非仅靠这两个细节，《通鉴》记此事的第二部分在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应受到充分的注意。

第二部分中，房、李论秦府旧人的安置问题，房玄龄强调了未被重用的旧人“嗟怨”，李世民用“择贤才而用之”来回答。这一细节在《贞观政要》中所体现的只是李世民用人原则中的“至公”之道，而放进《通鉴》此条，其承载的信息就发生了变化——秦府旧人在玄武门之变发生后因未见用而“嗟怨”，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已经成为“诸将争功”叙事的重要背景。追随李世民者期待升迁，盼望封赏，然而未受重用造成了极大的心理落差，因此他们有“嗟怨”之表现。随后而来的褒奖功臣事件，只封赏了长孙无忌等五位首功者，他们又将有何等表现？恐怕《通鉴》所述的“诸将争功，纷纭不已”是理所当然的结果。

通过补记房、李论秦府旧人之事，《通鉴》成功地赏功当日出现的“诸将争功”场面找到了合理的解释，通过在这两个也许互不相干的事件之间建立联系，使此段叙事呈现出一种合理性，即叙事结构内部的逻辑自洽。

通过“诸将争功”事件两部分内容的联系，《通鉴》为自己的叙事链条创造了一个首尾呼应的模型：

颁诏—诸将当场争功—李神通质疑—李世民释疑—诸将悦服……补记房、李论秦府旧人“嗟怨”事—诸将当场争功事出有因

综上所述，《通鉴》的叙事并未完全突破《汉书》中的论功争功叙事模式，但和削足适履的唐代国史、实录相比，其能够尽量回避史源中不合理之处，想象了一个也许未曾发生过的争功现场，又选择以房、李论秦府旧人嗟怨之事对此加以弥合。这就是《通鉴》对其史源叙事模式的修正，其做出修正的重要原因，正是该书“求实”之宗旨。

### 三、想象的反对派：争功事件中李神通形象反映的“资治”追求

如前所述，《通鉴》对其史源叙事模式的修正与细节的重新编排源自其对相关史源中有违史实之处的考证，而《通鉴》对“诸将争功”的叙述，也包含了司马光等对唐初历史的重新理解。在重新理解唐初历史的过程中，“当场争功”与

“论秦府旧人”建立了逻辑关联，而现场质疑九月二十四日诏令的李神通，被描绘成李世民的立对立面，反衬出其“至公”治国理念的正义性。这种叙事手段，反映出《通鉴》对“资治”的追求，此段对李世民治国理念的凸显，正体现了司马光的撰史主张。

《通鉴》与《唐会要》等史源在有关李世民为李神通释疑的记载中，有一处明显不同。在《唐会要》等文献中，李世民批评李神通“叔父虽率兵先至，未尝身履行阵”，而《通鉴》则记作“义旗初起，叔父虽首唱举兵，盖亦自营脱祸”。两相比较，《通鉴》中李世民的语气更为严厉。

《通鉴》中这种言辞犀利的批评，从史实而言并无问题，据《旧唐书·李神通传》载：

神通，隋末在京师。义师起，隋人捕之，神通潜入鄠县山南，与京师大侠史万宝、河东裴勳、柳崇礼等举兵以应义师。遣使与司竹贼帅何潘仁联结。潘仁奉平阳公主而至，神通与之合势，进下鄠县，众逾一万。自称关中道行军总管，以史万宝为副，裴勳为长史，柳崇礼为司马，令狐德棻为记室。高祖闻之大悦，授光禄大夫。从平京师，拜宗正卿。武德元年，拜右翊卫大将军，封永康王，寻改封淮安王，为山东道安抚大使。<sup>[18](P2340)</sup>

李神通为李渊堂弟，李渊起事后确因逃避隋朝官府的追捕而联络豪杰响应李渊，故而李世民说他“虽首唱举兵，盖亦自营脱祸”也是实情。然而，李世民当时是否会以此种口气训斥李神通？

李神通在李世民与李建成争夺储位时，明显是偏向李世民的。据《旧唐书》卷六四《隐太子建成传》记载，李建成与元吉“谋行鸩毒，引太宗入宫夜宴，既而太宗心中暴痛，吐血数升，淮安王神通狼狈扶还西宫”<sup>[19](P2417)</sup>。李世民对其也有特别优待，《通鉴》卷一九二《唐纪八》高祖武德九年十一月庚寅条记载，“降宗室郡王皆为县公，惟有功者数人不降”<sup>[20](P6025)</sup>，这少数没有降封的郡王中就有李神通，他在贞观四年去世后，李世民为之废朝，赠司空，谥曰靖<sup>[21](P2341)</sup>。按照谥法，以德安众曰靖，可知李世民对其一生行事持肯定态度。这些材料都表明二人关系十分

密切，李神通在赏功诏书公布时的争功之语，是其作为首义功臣、宗亲与李世民的支撑者，将对新进文臣房、杜列为首功的不满，李世民大可温言劝诫，而不是面斥其过。而且，《唐会要》等文献均有明确记载，李世民对他的批评只是“虽率兵先至，未尝身履行阵”，这是对其指责房玄龄等“专弄刀笔”的回应，委婉地指出其亦未身先士卒冲锋陷阵，这一说法也与后文所言“叔父于国至亲，诚无所爱”的基调一致，说明李世民并不打算在财物赏赐上对李神通有所吝惜。

以上文献与史实都表明，李世民不会如《通鉴》所记那般怒斥李神通，因此《通鉴》所记李世民斥责李神通之言论，应是此段中又一处对文本的改写，而这一改写也与上节所言《通鉴》叙事模式有关。

在《通鉴》对此事的叙事逻辑中，秦府旧人对现状不满在先，此种不满情绪积至颁诏褒奖首功者之时爆发，“纷纭不已”。李神通虽非秦府旧人，但自恃出身与往日功业，故在此情境下向李世民发难。《通鉴》在追记房、李论秦府旧人不满之事时，李世民就明确表示了治国应“至公无私”，对府中旧人重私利而轻公义之言论较为不满，在此语境下与房、杜争功的李神通，自然也被《通鉴》塑造成李世民治国理念中的对立面。

事实上，在《唐会要》与《旧唐书》中，李神通对褒功诏书的质疑只是其个人不明大体之举，对于这位一时糊涂的长辈，李世民采取了相对温和的回应方式。《通鉴》既将李神通与诏书颁布时的“诸将争功”相联系，又将其为自己论功之事与秦府旧人“嗟怨”做类比，将他们视为亲旧的代表，作为“至公”之道的反对派被打入另册，以此两例反复申明李世民的执政理念。在此叙事策略下，李世民与李神通的对话也被处理为两种理念间的辩论。李神通遭到李世民不留情面的讥刺，正是这一叙事结构中的历史想象。

《通鉴》对李神通与李世民论争的处理，虽立足于其史源，但有意改动对话内容，使李世民否定李神通之功绩，则有将历史简单化之嫌。这与赏功之日诸将当场争功之事虽同属《通鉴》的历史想象，但不可同日而语。此处对历史的改写，将李神通与未受重用之秦府旧人视为一体，作为李世民推行新政的阻碍，由此愈显李世民之

公心，而显李神通之偏狭。为了强化二人的形象差异，以至于在贞观四年之事时未采录李神通去世后李世民为之辍朝的材料。与之相比，同在贞观四年去世的杜如晦则受到特别的重视，《通鉴》不但记载了其去世时间，更对其病重后受到李世民的关怀与去世后李世民对他的怀念加以渲染。而与李世民的常有意见分歧的封德彝，因偶有合乎贞观之政的议论，兼之身为武德重臣，故其去世之事亦有记载。

作为贞观历史上的“失踪者”，李神通是《通鉴》想象出的反对派，他在《通鉴》所记载的贞观历史上只出现在“诸将争功”事件中，反衬了李世民执政理念的正义性。与史实反差极大的这一形象塑造，正可作为司马光选择“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的案例以“资治”的撰史主张。但是，为“资治”而对李神通的形象进行矮化，对《通鉴》“求实”之宗旨有所损害。

李世民在《通鉴》中被塑造成一个足可垂范后世的“圣君”，“诸将争功”事件的叙事主题也是彰显其“至公无私”的治国之道，司马光等人就是以此为出发点，对原有材料加以改写，最适合用来表现这一主题的关键人物李神通被施以文学性的改扮，成功地作为李世民的对立面而存在于该事件的描写之中。

#### 四、《通鉴》叙事研究的方法

本文通过对《通鉴》“诸将争功”之事的分析，考察了《通鉴》与其史源在叙事结构、细节描述与人物塑造上的异同，结论是：在叙事模式的建构上，《通鉴》对其史源在史实上的漏洞加以修正，在基本保持原有叙事结构的基础上描绘出不同于其史源的叙事链条，并做出了较史源更接近史实且符合逻辑的想象。但在此叙事结构中，为突出李世民的执政理念而对与之发生争辩的李神通形象进行了简单化的文学性处理，以牺

牲史实为代价来表现其“资治”精神。

在对“诸将争功”之事进行细读之后，我们对如何研究《通鉴》的历史叙事也有一些方法上的认识，现不揣鄙陋，略述于后，以期求教于方家。

因为《通鉴》以前代史书为主要材料且时有改作，故而若要考察《通鉴》的叙事特征与叙事结构，首先就应将其与相关史源做文本上的比勘，分析哪些内容是承袭自其史源，哪些是《通鉴》重新编排甚至重写的。在比勘过程中，除比较文本在内容上的异同外，还应对不同文本的性质加以分析，以确定是否会因文体不同而出现不同的表达形式，从而对整体叙事产生影响。

在文本比较过后，对《通鉴》为何会有改作与重写就应进行深入探讨。与后现代思潮影响下史家对史著的怀疑态度有所不同<sup>①</sup>，我们仍认为历史著作中保留有丰富的史实或相关信息，因此叙事研究不能仅在文本层面做语言学或修辞学方面的考察，也不能仅停留在史源学层面对《通鉴》叙事加以议论，还应充分考虑其叙事背后是否有考订史事后重述历史的可能性。《通鉴》虽以撰述见长，但其长编考异之学正体现了历史考据学的基本方法，欲对其叙事进行研究，亦应至少重新经历一次司马光做“考异”的环节，如此方能对其叙事进行评估，认定构成其叙事逻辑的重要内容中，何处为修正前史失实而得出的可信结论，何处为符合逻辑之历史想象，何处为不合史实之个人发明。

经过以上两个环节，便可对《通鉴》与相关史著在叙事结构、叙事特点上的异同加以初步分析，比较它们在叙事逻辑上的差异，并尽可能地对《通鉴》不同于他书之处进行解释。此外，对于《通鉴》叙事链条中处于重要细节之外的情节与人物角色加以考辨，将需要进一步解释的内容加以考察，在此基础上对其叙事结构与叙事逻辑做出较为完整的梳理，便可大体复原《通鉴》的编纂思路与叙事手法。

<sup>①</sup> “后现代”思潮在理论和研究方法上并不具有一致性，不过持此立场者有一个较为共同的认识，即通过史料并不一定能够认识客观历史，经过史学家编纂的历史记载只是通过建立某种叙事结构反映编纂者的意识形态。基于此点，后现代史学致力于批判以往带有“现代”意识的历史观，并对编纂史料所蕴含的意识形态与叙事特点进行反思。有关“后现代”思潮在史学界的具体影响及其批评，参见吴莉苇：《史学研究中的后现代取向——从几部论著看后现代理论在史学研究中的利弊》，载《史学理论研究》，2000（2）。赵世瑜认为，对冠以“后现代”之名的、对已有史料与理论的反思应受到充分重视，后现代史学尽管不认可编纂史料能够反映客观历史，但其从文本入手进行史料批判的思路应成为重建历史认识与历史叙事的重要途径。参见赵世瑜：《历史学即史料学：关于后现代史学的反思》，载《学术研究》，2004（4）；赵世瑜：《后现代史学：匆匆过客还是余音绕梁》，载《学术研究》，2008（3）。



对《通鉴》编纂过程的复原并非《通鉴》叙事研究的目的，而只是这一研究的开始。司马光及其合作者能够使用与其他史著大体相近的材料，支撑起一个对过往历史进行重述的新模型，最紧要者就在于他们在搭建叙事结构时所持的思路和将这一思路付诸实施的具体叙事手法。只有将编纂者在微观层面编排缀合史料的操作手法、中观领域内建立起的叙事结构和宏观角度所持的理念浓缩到某些具有典范意义的案例中进行综合考察，才能够避免仅仅将《通鉴》视为普通史料之一而与其他编纂史料与原始资料互证——

尽管《通鉴》的确保留了一些其他史书中没有的宝贵材料。

在《通鉴》叙事研究中，有关唐代的资料无疑是最丰富也是最适合进行案例分析的，与《唐会要》、《册府元龟》和两《唐书》等材料相对照，便可发现《通鉴》独有的叙事特征及其叙事中蕴含的理念。这不但能让我们看到《通鉴》与两《唐书》在讲述唐史时“横看成岭侧成峰”的不同意趣，更可以突破以往限于从“臣光曰”这类评论中分析司马光史识之做法，而对中国史学“寓论断于叙事”的叙事学特征有所发明。

### 参考文献

- [1] 海登·怀特：《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  
[2] [10] [12] [20] 司马光：《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2012。  
[3] 王溥：《唐会要》，北京，中华书局，1955。  
[4] 王钦若等：《册府元龟》，中华书局影印本，1960。  
[5] [6] [9] [11] [13] [15] [18] [19] [21] 刘昫等：《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  
[7] [8] 吴兢撰，谢保成集校：《贞观政要集校》，北京，中华书局，2003。  
[14] 林宝撰，岑仲勉校记：《元和姓纂》（附四校记），北京，中华书局，1994。  
[16]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  
[17] 李开元：《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

## Sima Guang's Textual Criticism and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in *History As Mirror* : A Case Study of the Event of Merit Scrambling among Some Generals under the Reign of Emperor Taizong of Tang Dynasty

ZHANG Nai-dong<sup>1</sup>, LIU Hou-bin<sup>2</sup>

(1. The School of Chinese Classic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2. The School of Histor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Abstract:** The story of merit scrambling among some important generals under the early reign of Emperor Taizong of Tang dynasty was represented by Sima Guang in his *History As Mirror* (*ZiZhi Tong Jian*). As a new way of historical narrative, *History As Mirror* built a different narrative logic from its source books, and represented some stories with historical imagination and situation constructing under its purpose of aid in governance. This paper summarizes some narrative characteristics of *History As Mirror*, and proposes some research methods for the study.

**Key words:** *History As Mirror*; event of merit scrambling; narrative model; historical imagination

(责任编辑 张 静)